

专栏结语：类比与发明，学科与想象力

Epilogue: Analogy and Invention, Discipline and Imagination

张峰 | ZHANG Feng

无论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 (Herzog & de Meuron) 向艺术家如约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伊夫·克莱因 (Yves Klein) 等的借鉴，还是路易吉·卡其亚·多米尼奥尼 (Luigi Caccia Dominioni) 向“空间陶瓷 (ceramiche spaziali)”的指涉，又或是我们近年来常看到的“布景术”与室内设计的融合，当代建筑学学科边界不断被想象力拓展，各学科之间的边界也由此越来越模糊不清。如果将建筑学看作具有某种固定组织方式和历史传承的学科，那它无疑在经受学科自主性所具有的“中心化”的风险和挑战：确立学科边界的企图，会预先确立某种稳固和静态的学科规律，从而使得真实的动态发展受限——现实与解释不符，应该去调整的是解释，而不是现实。

因为“学科”和“想象力”的结构性矛盾，学院派的建筑师总是很谨慎地对待想象力：他们总是试图确立学科的边界，试图寻找其内部的规律，了解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与关系；而想象力总是打破规则，建立本来不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想象力无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因为想象的能力，人类可以天马行空地进行直觉的幻想——脱离于智识的训练、脱离于现实条件的束缚，构造出完全虚幻的场景，这种想象力增益人类讲述故事的能力，促成了人类间大规模合作的可能；赋予人类创造新奇美好事物的能力，但要去应用此种能力应当以创作者意志的警惕性为前提，从而剔除掉某些迷失于幻想的想象。另一种想象力赋予人类将时空中的物质实体转化为心理实体的能力，并将其安置在心智中的某个位置上，脑海中可以感知这些实体的属性、能力、功用，并将其重新组合，构建出新的可以在现实世界中真实运作的机制，这种想象力是人类可以

依靠资源的各种组合去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也是建筑中进行建筑构造、材料组织的根本能力。这两种想象的能力，是建筑师从业技能的根本。

如今已是瑞士“学院派”的类比建筑学理论，试图定义建筑设计的运行结构：建筑师首先将已存在的建筑抽象化、图式化成特定的图像，并分门别类地储存在记忆当中，然后在设计过程中从过去的记忆中调用某些图像，通过解构或重构进行二次安排——他们称为“相异的重复” (repetition different)，从而获得新的图像。类比建筑学十分强调想象力结构基础中的“联想能力” (associative power) 和“图像”，这一方面符合现代神经科学对想象力生理结构的探索：通过神经元突触的连接形成各种回路，建立的感知—认知—储存—调用的联想过程，其媒介就是图像；另一方面，类比建筑师却在设计之初就对陌生的幻想心存戒心，却又不能不承认，许多原型的发明都是建筑演化过程中的“基因突变”，而非已存建筑语言的重新组织，也许是原型创造过程以及它们如何在社团内得到默许和使用的机制过于神秘，使得类比建筑师在理论与设计方法上封印了自己创造原型的想象力。

与米洛斯拉夫·锡克 (Miroslav Šik) 在学术背景上同源不同路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则对那些由建筑群所构成的语境 (architectonic context) ——对于类比建筑师来说是“设计的源泉”——表现出了彻底地不屑，不论是蓝屋、石屋、弗莱的摄影工作室、可口可乐仓库，它们都以一种“统治”的姿态占据了自己的地块，这种统治的宣言可能出自颜色，可能出自万能的方格，可能出自抽象的雕塑性体量，也有可能出自某种陌生的建构关系的呈现。石屋和利可

作者：

张峰，上海重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瑞士工程师与建筑师协会注册建筑师。

乐仓库作为转型时期的典型案例，呈现出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两位建筑师对图像和建造两者皆做异化的尝试；建筑语言和建构关系本身不仅仅是建筑学遗留至今的用以使建筑得以完成的手段，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语言和建构方式的运用，使得它们被深刻地编织进了建造行为本身的因果结构当中了。他们故意将建筑元素的语义和形式予以脱离，使得之前人们熟悉的因果结构在此难以适用：厚重干砌石墙竟然不承重，外部的混凝土框架竟然不是背后结构的真实再现 (representation)，这一切都与建筑师大脑的智性直觉背道而驰；然而如果要去仔细分析，“填充”这个动作所描述的，其实仅仅是将“某种容器”填满，而不在意填充物本身的构造规则，无论是“砌筑石墙应当承重”，还是“外框架应该对应于内框架”，其实都只是经验性的心理范式。另外，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早期作品中，总是充满了多个层级的抽象隐喻的循环：比如对于石屋外观的识解，石墙是框架的填充，还是框架是石墙的束缚？转角的处理显然使得两种建构逻辑的呈现力度趋于平均。而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却涉及人类心智对于“事件到底是什么”的好奇。诸如此类，那些最通常不过的建筑元素总是能呈现出经历过反复思考的复杂性，并获取建筑内部元素间的封闭性关联；两位建筑师能够在建筑的因果结构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和阶段，将强有力的逻辑悖论置于其中，再通过非凡的构造与材料组织能力，将之后的每一步设计行为进行逻辑上的（看似）“合理化”处理，使得他们的建筑经常“合乎逻辑”，却“超乎直觉”，这无疑是其非凡想象力的体现。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如同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口中的“狐狸”：“他们知道许多事情，体察世间万物的复杂微妙，因此宁可自己陷入矛盾，也绝不强求圆融一统的真理，恰如狐狸遇事之灵活花巧、机智多变”，法国的建筑师让·普鲁维 (Jean Prouvé) 则是一个典型的“刺猬型”工程师角色——虽然他在南希的自宅中呈现出了局部的狐狸型特征，而他的实践，无疑拓展了人们对于建筑师如何利用想象力构建一种“在现实中可以运行的机制”的认知。马库斯·彼得 (Markus Peter) 在关于让·普鲁维研究的描述中，引入了“协同作用” (Synergie) 作为关键词——一个更常见于金融、

生态、医药等行业的术语——用以描述“整体作用强于局部总和”的加乘效果，在发展中追求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功能复合、批量生产。在完美协同的机制里，各个元素间的矛盾会被完全化解，并且所有构件的生产均可以依靠（最大化）脱离人力的机械来进行生产。让·普鲁维毕其一生所探索的几个构造体系如立面系统 (Voile-Grille)，屋顶综合系统 (Shed System, Coque System)，屋架系统 (Portique Central System) 等，其样本是当时汽车的多功能复合构造与自动化生产流程；他试图在建筑中实现不同构造功能元素的整合——虽然在这条探索道路上，他面临了公司破产、专利转让带来的发展困局——但他最终还是向当代建筑产业提供了三明治式的墙体复合构造原型（覆层—保温—结构），以及基于大型机械的建筑构件工业化生产模型。

无独有偶，上述建筑师都借助居住类建筑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探索。在过去增量时代的中国，我们的居住建筑更强调了它作为商品的性质——面积和单位价格才是大家最关注的；而在当下的存量时代，可以预见建筑师也将在新的社会观念的推动下，借助居住类建筑进行设计、理论、历史、技术等各个维度的探索。现代主义建筑盛世过后的许多欧洲建筑师站在了批判现代主义革命 (revolution) 的立场上，强调建筑的发展应当是演化 (evolution) ……不过，演化过程中的随机性突变，恰恰是种群应对意外的存活机制之根本。这正如学科与想象力的辩证关系，允许想象力引发的突变，才是学科能够存续的结构基础。梳理和呈现上述辩证关系是策划本次专栏的目的：希望呈现给读者那些特定的建筑物或建筑方法——不论是“类比”或是“发明”，是如何出现并适应当时具体的人文与物理环境的。不论它们作为历史素材对于当下环境的借鉴意义如何，这些案例的解读如果能帮助我们了解到学科发展的某种机制，并激起我们探索、求知或是实践的欲望，那就是一种巨大的收获。

[感谢王莉慧老师对专栏组织团队的信任和支持；感谢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尤玮、侯雅馨、李享同学在专栏组织和执行中给予的帮助。]